

守望农耕文明：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的 价值认知如何影响其传承意愿*

王博杰^{1,2} 何思源¹ 闵庆文^{1,2} 孙业红³

摘要：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系统传承对于实现生态保护目标和赓续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均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典型传统农业系统——广东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和归纳式质性内容分析法，实证分析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认知如何影响其传承意愿。结果表明：农户认为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传统农业系统的核心价值，其他价值间的交互协同关系反映了农户基于价值取向的生计策略；农户在生计策略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受生计自由度的动态影响，其生计结果和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意愿表现出复杂性和异质性；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由于价值认知和主体责任意识的差异，对政府政策工具的期待呈现“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分化。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户传承传统农业系统的意愿及其机理，并对实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目标、促进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传承、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传统农业系统 农耕文明 生态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 价值认知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内容，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中华文明长期秉承“天人合一”理念，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优秀农业文化蕴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传统生态智慧，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隋斌，2023）。习近平指出：“要把保护传承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治理视角的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生计互动机制研究”（编号：423713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保护兼容性生计及其决策机制研究”（编号：42001194）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何思源。

^①参见《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

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①中华民族的历代先民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依托区域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和特色农业文化，演化为以农、林、牧、渔业等为主导的传统农业系统（Jiao et al., 2023）。传统农业系统（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简称 TAS）是指长期农业生产下农民的知识与实践与各类农业生产和环境要素优化组合后形成的生产模式，强调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动态平衡，是动态保护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体现。相对于近现代农业模式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的特点，传统农业系统更加强调尊重自然发展规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实践中更加突出与自然相融合的生产技巧和生态智慧。诸多研究与实践均证实，传统农业系统在生态保护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顾兴国等，2018；Zhang et al., 2024）。传统农业系统不仅受益于优秀农耕文化和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也贡献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传统农业系统中，重要农业文化遗产（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简称 IAHS）^②是历史时期创造并不断发展变化，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和文化价值的传统农业系统，由农民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且世代传承。它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和农业技术体系，在保护重要农业物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多元价值（闵庆文，2020；李华胤，2022）。习近平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③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业系统的典型代表，融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既是记载农耕文明演进的历史文物，也是满足现代发展需求的农业生产空间，更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生态文明和农耕文明协同发展的精华所在。

农户作为传统农业系统活态利用的核心主体，既是传统农业系统的守护者，也是影响传统农业系统存续的重要力量。在中华农耕文明思想的长期浸润下，传统农业系统中的农户形成了崇尚自然、尊重生态的价值认知。这种生态观直接引导农户自觉开展有利于自然资源可持续经营的生产行为，促进农业多功能的实现和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发展。然而，受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诸多传统农业系统中，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维持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户原有的生态价值认知正在悄然改变。这使得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和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其所具有的生态保护功能也可能随之流失（闵庆文，2020）。学术界围绕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认知展开了诸多探索，特别是从文化、生态、经济、社会 and 景观等价值层面进行了系统梳理（Nath et al., 2024）。具体而言：部分研究聚焦于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旅游价值的认知及其行为决策（Su et al., 2020）；也有学者从价值挖掘的角度，对不同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利用路径进行分析（朱志平和王思明，2021）。然而，鲜有研究从生态保护角度关注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认知与其传承意愿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农户关于传统农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4-125页。

^②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括FAO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农村部认定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③参见《习近平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https://www.gov.cn/xinwen/2022-07/18/content_5701591.htm。

业系统中的价值认知对其传承意愿影响的逻辑关系，从农户视角探索传统农业系统的多元价值如何适应现代发展，帮助农户通过可持续经营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增进民生福祉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基于此，本研究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广东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为案例，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fsQCA）和归纳式质性内容分析法（inductiv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简称 IQCA），拟从价值认知角度揭示农户传承传统农业系统的内生动力，以期为实现生态保护目标与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逻辑框架

（一）理论分析

1. 可持续生计及其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可持续生计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贫困研究，以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 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应用最为广泛。可持续生计框架认为，在脆弱性背景和外部制度变化影响下，农户、家庭或社区利用其资产、能力等自身资源禀赋开展的创收活动构成了其生计行为（D’Annolfo et al., 2021）。在此基础上的可持续生计是指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的压力和冲击并从中恢复，同时在不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维持或提高农户生计能力，并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谋生机会的生计模式。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通过融合生计资本、生计能力、生计安全、脆弱性、适应性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等相关概念开展农户生计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和管理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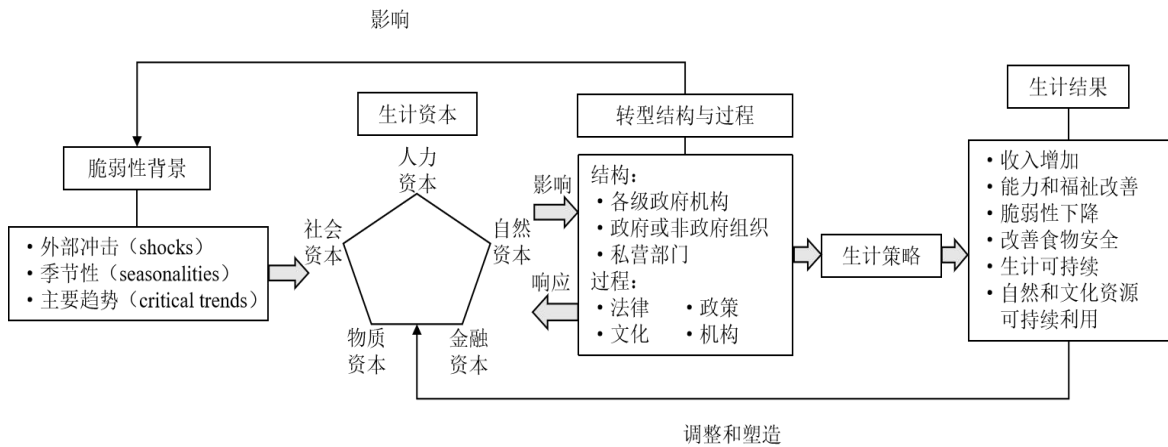


图 1 可持续生计框架

注：该图系笔者参考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DFID，1998）绘制。

对于传统农业系统而言，尽管它能够在历史演进中保持生产功能，但仍旧面临着突出的外部环境变化。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生物入侵等自然因素，与农业新技术、外来文化、社会阶段性发展政策等人文因素共同形成脆弱性背景，可能造成传统农业系统中农业生态功能的退化、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传统农业技术和知识体系的丧失等，从而对传统农业系统的延续与发展产生胁迫。因此，

引导农户自发传承传统农业系统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对于降低脆弱性至关重要。一方面，需要将传统农业系统传承与农户生计发展相联动，通过保障农户的经济利益，激励他们积极参与保护传统农业系统；另一方面，需要在保障农户生计的基础上，使他们认识到传统农业系统的多元价值潜力，从而唤醒农户的文化自觉性。在本研究中，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是指农户在不改变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关键要素^①的基础上，开展包括农业在内的多种生产和经营活动以获得收入和其他福祉的过程。在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传承意愿即是否愿意继续开展特定生计行为。综上，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可理解为，在其脆弱性背景下，农户基于自身的资产、能力等资源禀赋，在受制于影响其资源获取和生计策略组合的结构化因素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种生计行为决策。多种生计行为共同构成的生计策略会带来一定的生计结果，从而影响其传承意愿，即下一时期的生计行为决策。

2. 感知价值理论及其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本研究引入感知价值理论以丰富对农户生计行为的理论解释。感知价值理论最早起源于 Zeithaml (1988) 对产品营销的研究。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及行为受到其对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的影响，而感知价值则是消费者对各类感知利益和风险之间的主观权衡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学者从个体行为形成机制层面进一步丰富感知价值与个体行为决策的关系 (Woodruff, 1997)，其互动关系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个体会结合自身的背景和环境条件，对事物的属性或行为结果形成一定的认知；其次，结合伴生性的收益或风险进行主观判断评价和重要性权衡，形成个体的感知价值；最后，在感知价值的影响下，个体产生特定背景下的行为意愿并做出响应。综上所述，感知价值理论对个体行动的逻辑解释路径遵循“认知层次—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响应”的范式。感知价值理论被广泛用于农户生态补偿 (杨福霞和郑欣, 2021)、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 (胡银根等, 2020) 等个体决策行为的研究中，其所具有的良好解释力已得到普遍认可。

传统农业系统的核心价值源自传统知识与技术的积累和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其价值留存的关键是农户在价值认同基础上保持传统农业系统的完整性和生产力，维持和谐的人地关系 (党国英等, 2024)。传统农业系统因其多功能性而具有生产、生态、文化、景观等多元价值，农户会依据这些功能价值对生计的利弊进行判断和评价。由于个体、家庭特征和脆弱性背景差异，农户会形成不同的感知价值，这种感知价值判断差异进一步带来农户的传承意愿和生计行为的分化。

(二) 逻辑分析框架

生态与社会的可持续性传统农业系统存续的内在基础，使其不仅具有基础的生产功能，同时兼具生态保护、生计供给、社会维系和文化遗产等功能，具有多元价值 (焦雯璐等, 2021)。农户在追求生计发展和传统农业系统传承时，依赖其个体能力和家庭生计资本等内部因素，对传统农业系统多元价值的判断往往以是否有利于生计可持续为标准，同时也受到脆弱性背景、利益相关者组织及关系等一系列结构化的外部因素、制度及其转化过程的影响。

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侧重和群体异质性会带来生计行为分化，在结构化因素

^①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关键要素包括食物与生计安全、农业生物多样性、地方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农业文化、价值体系、社会组织，以及海陆景观特征。

的同时影响下，外显为农户的生计结果差异，并可能通过影响下一期的生计行为决策，即传承意愿，进而加深传统农业系统脆弱性：传统农业系统传承的核心在于生产性功能的维持，但低于预期经济收益的生产性功能可能导致农户放弃农业生产经营，特别是在尝试拓展其他功能以发展生计遇到瓶颈的情况下，农户更有可能放弃传承传统农业系统。

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需要以不损害系统关键要素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与创新性发展。因此，提升农户传承意愿需要激励农户做出维持传统农业系统关键要素的生计行为决策，在提升生产稳定性的同时，提高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多功能性的理解，并提升其将这些多功能性转化为经济价值的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应通过有效的制度与组织构建等外部政策，帮助农户获取相应资源、优化资源组合、提升个体能力，从而促进农户在一定时期内对生计行为进行优化调整，最终实现传统农业系统的稳定传承。

基于此，本研究以农户的“价值认知差异—生计行为分化—系统传承意愿提升”为分析逻辑，通过将实现传统农业系统生态管理成效和农户生计保障目标的双赢作为假设，从不同群组的农户层面探究如何匹配外部政策与农户价值认知，进而提高其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意愿。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了农户的传统农业系统价值认知对其传承意愿影响的逻辑链条，具体分析框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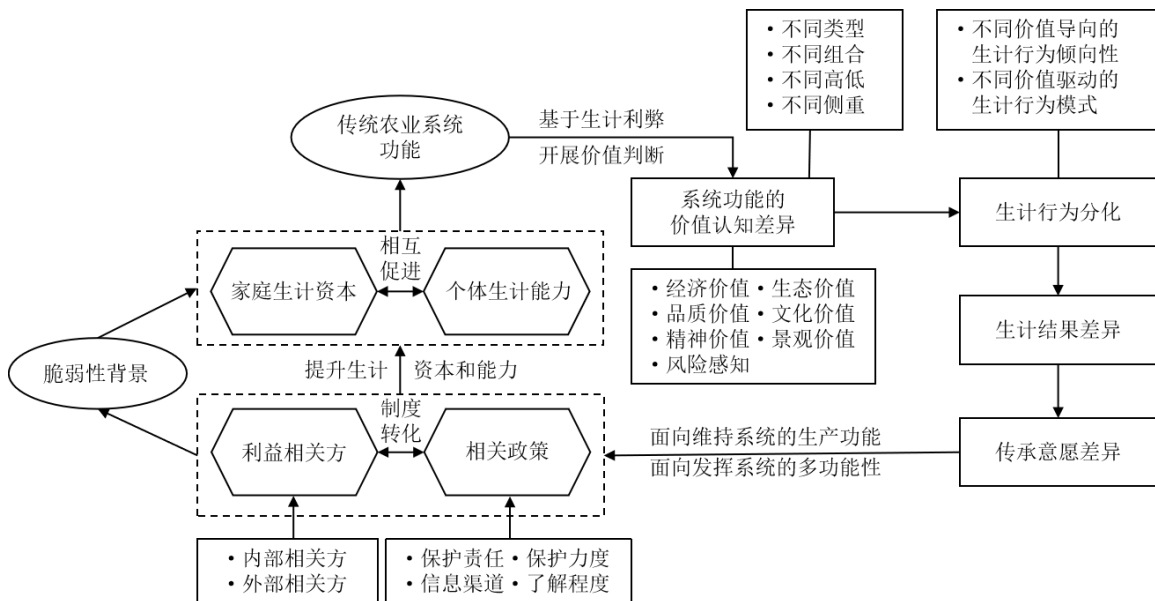


图2 农户的传统农业系统价值认知对其传承意愿影响的逻辑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 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取广东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作为案例，其核心区覆盖范围包含以粤东凤凰山为核心的潮州市潮安区凤凰镇和饶平县浮滨镇。凤凰山位于粤东韩江流域，区域内包括1个国家级和29个地方级自然保护地，旨在保护闽粤山系的森林生态系统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在传统农耕思想和生态

保护理念的影响下，凤凰山地区的茶农长期坚持传统的茶园生产管理模式。作为中国茶系中四大乌龙茶^①的代表之一，以潮安区凤凰镇为核心的“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和以饶平县浮滨镇为核心的“广东饶平单丛茶文化系统”分别于2014年和2023年入选第二批和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二者构成了广东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以下简称“单丛茶文化系统”）。

单丛茶文化系统有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农业文化底蕴和区域影响力。潮州地区的单丛茶种植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末年，距今已有约900年历史。凤凰山地区先民在世的实践中不断对茶树培育、茶园管理和茶叶加工技术进行探索改进，逐步形成具有岭南特色的单丛茶文化系统（刘少群等，2010）。以单丛茶为内核的工夫茶文化，已作为潮汕地方文化特色得到广泛认同。长期以来，依托于单丛茶文化系统的世代传承，凤凰山地区的茶农已对单丛茶文化系统形成了稳定的价值认同和生态化生产意识，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并行不悖，成为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据潮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在遗产地^②，仅100年以上的古茶树就有1.5万余株。这些广袤的古茶园不仅为单丛茶文化系统多元价值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构成遗产地茶农赖以维系的生计基础。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市场需求改变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当地以单丛茶生产和加工为核心的传统农业系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农户的核心价值认知也随之发生变化，单丛茶文化系统的传承和发展面临更为突出的现实阻力。在区域生态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和茶农生计等多重需求的交织下，如何更好地理解农户价值认知对单丛茶文化系统传承的影响，进而推动单丛茶文化系统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传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二）研究设计

1. 问卷设计与半结构式访谈。本研究结合重要文化遗产的特征和保护要求，以农户的“价值认知差异—生计行为分化—系统传承意愿提升”为分析逻辑，将实现传统农业系统生态管理目标和农户生计保障目标的双赢作为假设，探索如何从农户层面促进传统农业系统的稳定传承。研究量表开发与问卷设计根据传统农业系统的特点，充分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课题组前期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认知和传统农业系统传承的相关研究进行优化。问卷主要包括受访农户的基本特征、价值认知和传承意愿三个部分。受访农户的基本特征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收入情况等。价值认知和传承意愿的问题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测量，以评估对价值重要性和传承意愿影响的认同程度。分值从低到高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5种程度。此外，调查问卷以外的半结构式访谈包括4个核心问题，即“单丛茶文化系统对您的家庭和社区重要吗？”“单丛茶文化系统还为您提供了其他价值吗？”“以上您所提到的价值，哪些对您的家庭和社区更为重要？”“您希望您的孩子未来继续从事与单丛茶文化系统相关的工作吗？”。

^①四大乌龙茶包括：闽北乌龙（武夷岩茶、大红袍等），闽南乌龙（安溪铁观音等），广东乌龙（凤凰单丛等），台湾乌龙（冻顶乌龙等）。

^②遗产地泛指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区或区域。

表 1 列出了关于价值认知的 8 个测度变量的相关题项，以及题项设置的参考文献。

变量	题项说明	参考文献
经济价值	家庭产量能满足加工与销售需求 茶叶销售有稳定的客源市场和销售渠道 茶叶加工销售的经济收入能维持家庭的日常生计	何思源等 (2020a)
生态价值	单丛茶文化系统对区域水土保持和微气候调节具有重要作用 单丛茶文化系统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单丛茶文化系统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单丛茶文化系统的管理与经营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焦雯珺等 (2021)
品质价值	单丛茶文化系统出产的茶更安全 单丛茶文化系统出产的茶更好喝 单丛茶文化系统出产的茶更受市场欢迎	Thanh et al. (2021)
文化价值	单丛茶文化系统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具有重要作用 单丛茶文化系统能够作为岭南饮食文化的代表之一 单丛茶文化系统促进了区域文化多样性发展	何思源等 (2020b)
精神价值	茶园的种植和管理让人心情愉悦 单丛茶文化系统增强了社区凝聚力 单丛茶文化系统增进了居民对家乡的依恋和文化认同	Zhu et al. (2022)
景观价值	单丛茶文化系统所形成的农业生态景观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单丛茶文化系统所形成的农业生态景观适宜开展游憩体验活动 单丛茶文化系统所形成的农业生态景观结构值得进行保护	张灿强和林煜 (2022)
风险感知	我能够应对茶园的病虫害、旱灾、冻灾等自然灾害 我能够承受茶园管理的各种成本 我认为单丛茶的市场价格合理	Khan et al. (2020)
传统农业系统重要性综合认知	单丛茶文化系统对我非常重要	

课题组参考何思源等 (2020a, 2020b) 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识别与构建, 根据原农业部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中对遗产特征的定义及保护要求^①, 并结合从已知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对当地社区在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具有多样化意义) 和潜在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在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代际平衡意义) 的角度, 选取了 1 个重要性认知变量来衡量对传统农业系统重要性的综合认知, 并设置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品质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景观价值和风险感知等 7

^①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中明确,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①历史传承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生产功能, 为当地农业生产、居民收入和社会福祉提供保障; ②蕴涵资源利用、农业生产或水土保持等方面的传统知识和技术, 具有多种生态功能与景观价值; ③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蕴含劳动人民智慧, 具有较高的文化传承价值; ④面临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生物入侵等自然因素和城镇化、农业新技术、外来文化等人文因素的负面影响, 存在着消亡风险。资料来源: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038095.htm。

个价值认知变量。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风险感知本质上不属于一种价值认知，但基于笔者的前期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Khan et al., 2020; 何思源等, 2020a），农户的风险感知能够直接影响其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认知和个体行为，因此，经综合考虑后将其归为价值认识维度的变量。

表 2 列出了关于传承意愿的测度变量的相关题项，以及题项设置的参考文献。

表 2 传承意愿的测度变量及题项说明

变量	题项说明	参考文献
信息渠道	我有稳定的渠道学习和了解单丛茶的各种知识 我对单丛茶保护和产业发展的想法有合适的渠道发声	Mwantimwa (2020)
茶农角色	茶农对古茶树的自发保护力度较好 茶农在单丛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上责任重大 村委会在单丛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上责任重大	何思源等 (2020a)
政府角色	政府的古茶树保护力度较好 政府在单丛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上责任重大 政府对茶产业的扶持力度较好 政府对以茶带旅的扶持力度较好	李禾尧 (2021)
游客角色	游客对单丛茶文化系统有一定的了解 游客在单丛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上责任重大	Su et al. (2020)
传统农业系统传承综合认知	我希望下一代继续传承单丛茶文化系统或者从事茶产业	

本文参考李禾尧 (2021) 的研究，从制度和组织构建角度将传统农业系统传承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型、战略型和边缘型三类（普通农民、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和游客分别为三类主体的代表），同时考虑以往研究中信息渠道对农户认知的显著影响（石志恒和张可馨, 2022），本文选取 1 个传承认知变量来衡量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传承的综合认知，并设置信息渠道、茶农角色、政府角色、游客角色 4 个传承意愿变量。

在正式调研之前，课题组邀请了 3 位来自人文地理学、农学和旅游管理学科的专家对量表进行评估，并组织了 67 位具有地理学、农学和管理学背景的本科生以及 12 位具有自然保护地和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背景的研究生对量表进行测试。测试结果显示，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数值范围为 0.761~0.913，均大于阈值 0.7；KMO 值范围为 0.704~0.832，均大于阈值 0.7；Bartlett's 球形检验的卡方值范围为 74.020~454.993，对应的 p 值均为 0.000。因此，本研究设计的量表在统计学上具有一定可靠性。

2. 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 fsQCA 进行基础分析，并使用 IQCA 对 fsQCA 的分析结果进行辅证和补充。本研究选择上述方法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影响农户行为的价值认知和传承意愿因素较多，通常基于线性关系假设，其测量目标是各变量之间的净效应，因此，在应对变量较多且相互关系尚未明晰、具有潜在组合影响效应的情况下，表现较为乏力。而 QCA 方法假设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并非线性独立的，而是通过条件变量的排列组合形成“组态”，进而共同作用于结果变量。因此，该方法能够从组态视角很好地解读不同前因条件的组合关系，对于“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解释具有一定优势。QCA 是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的集合论组态分析方法，通过以案例为导向进行组态比较分

析。这种方法能够通过分析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子集关系，从整体上探索由多重并发原因所形成的复杂问题组合（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fsQCA 更适合处理多前因条件变量的情况，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数据处理过程中对案例信息的流失，从而充分挖掘各类前因变量对结果所产生的组合影响作用（范香花和程励，2020）。因此，在第一阶段，本文主要采用 fsQCA 方法进行多元组态的分析和阐释。第二，尽管 fsQCA 方法能够在多重复杂因素的背景厘清因果关系，但它并不能确保研究者能够找到特定现象的“真实”动因（张明和杜运周，2019）。特别是某些因果关系的内在机制往往比外在现象复杂得多，需要谨慎解释分析结果。因此，本文在 fsQCA 的分析结果基础上引入 IQCA 进行补充论证，以提高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质性内容分析法最初来自学界对扎根理论的非规范应用。不同于扎根理论方法，质性内容分析法不强调从质性文本中抽取逻辑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它更强调对已有模型和现象的演绎解释（Creswell and Clark, 2017）。综上所述，将 fsQCA 和 IQCA 两种方法相结合，可以很好地探索和解读多重复杂因素的协同效应与互动关系。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1. 数据收集。研究数据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调查小组通过入户调查的形式收集。正式调查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2 日开展，调查小组由 7 名地理学和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组成。在正式调查之前，研究团队就半结构式访谈内容、居民沟通技巧、问卷发放程序等对调查员进行了系统培训。最终，共获取 98 份农户问卷及相应的农户访谈录音，经过筛选，剔除随意填答、相似度较高以及与家庭实际情况出入较大的无效问卷 9 份，得到有效问卷 8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0.8%。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 3 所示。

表 3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N=89)

变量名称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	变量名称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45	50.6	家庭年总收入	50 万元以下	20	22.5	
	女	44	49.4		50 万~100 万元	18	20.2	
年龄	19 岁以下	2	2.2		100 万~200 万元	16	18.0	
	19~30 岁	17	19.1		200 万元以上	35	39.3	
	31~45 岁	33	37.1	所在乡镇和自然村 (村落编号)	凤凰镇	大庵村 (FH-1)	20	22.5
	46~60 岁	25	28.1			狮头脚村 (FH-2)	10	11.2
	60 岁以上	12	13.5			李仔坪村 (FH-3)	8	9.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5	16.9			中心沿村 (FH-4)	7	7.9
	初中	40	44.9			官木石村 (FH-5)	11	12.4
	高中或中专	27	30.3			芹菜坑村 (FH-6)	6	6.7
	大专及以上	7	7.9			超苟村 (FH-7)	5	5.6
家庭土地面积	10 亩以下	12	13.5	浮滨镇	上社村 (FB-1)	7	7.9	
	10~20 亩	50	56.2		岭头村 (FB-2)	10	11.2	
	20~30 亩	13	14.6		夏校村 (FB-3)	5	5.6	
	30 亩以上	14	15.7					

调查活动分别在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凤凰镇和饶平县浮滨镇的 10 个自然村开展。由于当地农户以自然村聚居为主，每个自然村约有 20~30 户常住居民，调研小组采用逐户便利抽样的方法开展调查。受访者须为长期居住在遗产地内并从事茶叶种植及生产的农户。调查小组依据访谈提纲进行约 40~60 分钟的半结构式访谈，对访谈过程中的关键信息进行文字记录和标记，并在获得农户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同时，按照“调研村落—受访者顺序”对访谈内容进行编号。在对农户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后，由农户在调研人员的协助和解读下自行填写问卷。

2. 数据处理。对调查数据的处理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对所获取的问卷数据进行验证和分析。本文通过验证量表内部的一致性、收敛和区别效度，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本文采用 fsQCA 和 IQCA 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通过直接校准法，分别选择数据范围的下四分位点（25%）、中位数（50%）和上四分位点（75%）作为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的 3 个锚点，对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赋予隶属度并进行数据校准（张明和杜运周，2019）；为了降低矛盾组态的发生概率，将“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简称 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75；通过真值表分析，确定案例所获取的农户家庭样本数据与可能组态之间的对应隶属关系和分布情况；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结合调研笔记对访谈过程中的关键信息进行回溯，在此基础上提取与研究核心问题相关的文本内容，并进行编码。在第二阶段，为了提升编码的可靠性，3 位参与实地调查的博士研究生对文本内容进行背靠背分析，在对文本编码结果达成一致意见后，将文本内容与研究核心问题进行关联，用以辅证 fsQCA 的分析结果。本研究利用 Whisper 1.8.1 软件完成对访谈录音的文本转录，借助 fsQCA 3.0 软件实现 QCA 分析。

四、结果与分析

（一）单丛茶文化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农户生计特征

通过前期的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本文归纳了单丛茶文化系统的结构特征。整体来看，单丛茶文化系统呈现“森林—古茶林—高海拔聚落—茶园—低海拔聚落”的复合社会—生态景观结构。在该系统顶部，原始森林为各类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并对内部的水土保持和养分循环发挥关键作用。原始森林下方为海拔 800 米以上的古茶林区域，古茶树龄普遍在 100 年以上，有极高的古茶树种质资源保育潜力。与低海拔茶区的灌木茶丛不同，这里的古茶树大多已为乔木形态。古茶林周围沿山路分布着高海拔聚落，这里的农户保持着传统的古茶林生态管理模式。在低海拔茶区，茶树树龄普遍为 20~60 年且以灌木形态存在。相对于高海拔茶区，低海拔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地带，人口更为聚集。

由于海拔、局部小气候以及自然资本方面的差异，单丛茶文化系统内形成了两类不同的茶园生产经营模式。在海拔 800 米以上的区域，茶农以一年一季的春茶采制为主；而在海拔 300~800 米的区域，茶农则以一年 4~5 季的茶叶采制为主。由于茶园生产、管理和经营模式的不同，茶农群体的生计行为与生计结果呈现差异化发展特征。

（二）fsQCA 结果

1. 影响农户综合价值认知与传承意愿的必要条件。为了辨析农户综合价值认知与传承意愿的核心

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对前因条件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前因条件变量是否为必要条件取决于其相对于结果变量的一致性分值，当某一前因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分值在 0.9 以上时，则认为该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具体而言，本文前因条件变量包括价值认知变量和传承意愿变量，结果变量包括传统农业系统重要性综合认知变量和传统农业系统传承综合认知变量^④。表 4 展示了农户高综合价值认知下不同维度价值认知的一致性和覆盖率。

表 4 高综合价值认知下不同维度价值认知作为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高综合价值认知	
	一致性	覆盖度
经济价值	0.946	0.883
生态价值	0.933	0.906
品质价值	0.810	0.878
文化价值	0.707	0.856
精神价值	0.876	0.890
景观价值	0.817	0.875
风险认知	0.845	0.863

由表 4 可知，以产量和经济收入为代表的经济价值认知变量和以生态管理模式和保护意识为代表的生态价值认知变量的一致性均大于 0.9，说明这两个变量是高综合价值认知前因条件中的必要条件，即如果农户认为单丛茶文化系统具有高价值，则认同系统具有经济和生态价值。同时，在农户具有高综合价值认知时，其他维度的价值认知一致性系数均小于 0.9，表明这些维度的价值认知从单一层面来看，不能完全作为高综合价值认知结果的必要条件。因此，农户的高综合价值认知是多重价值认知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必要继续进行组态路径分析，以辨析不同维度价值认知的组合与作用机制。

表 5 为农户不同传承意愿影响因素的一致性和覆盖度。从中能够看出，信息渠道与各利益相关者责任重要性认知的一致性系数均小于 0.9，表明无论是在高传承意愿还是低传承意愿的结果下，均不存在核心必要条件对农户的传承意愿产生关键影响。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组态路径分析，以探析农户的传承意愿影响因素组合情况。

表 5 不同传承意愿影响因素作为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高传承意愿		低传承意愿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信息渠道	0.735	0.613	0.510	0.566
茶农角色	0.786	0.727	0.467	0.704
政府角色	0.855	0.775	0.560	0.635
游客角色	0.722	0.591	0.423	0.618

^④以结果变量的李克特 5 级量表分值作为判断依据，将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视为农户具有高综合价值认知（高传承意愿），将选择“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或“不确定”视为农户具有低综合价值认知（低传承意愿）。

2. 农户对单丛茶文化系统的整体价值认知特征。本文利用 fsQCA 结果，进一步验证农户综合价值认知与传承意愿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组合。借助于真值表算法可以获得简约解、中间解和复杂解 3 种方案，本研究参照相关研究 (Ragin, 2014)，选取简约解和中间解作为判断条件，将二者中均出现的前因变量定义为核心条件，将只在中间解里出现的前因变量定义为外围条件，并通过差异化符号对必要程度进行区分^①。

表 6 为农户对单丛茶文化系统的高综合价值认知的充分条件分析结果。从表 6 中可以看出，高综合价值认知下包括 5 条组态路径，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 0.75 的阈值，表明分析结果具有有效性。总体解的一致性达到 0.935，大于 0.85 的阈值，表明 5 条组态路径对所选取的农户群体案例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表 6 高综合价值认知的充分条件分析结果

	组态路径				
	经济—生态价值 导向型	文化—精神价值 导向型	品质价值 导向型	经济价值导向 (风险趋避)型	景观—经济—生态 价值导向型
经济价值	●	●	●	●	●
生态价值	●	●	●	●	●
品质价值	•	•	●		•
文化价值		●	⊗		•
精神价值		●		⊗	⊗
景观价值		⊗	•		●
风险认知	⊗			●	
原始覆盖率	0.295	0.351	0.253	0.338	0.393
唯一覆盖率	0.041	0.057	0.052	0.033	0.052
一致性	0.931	0.891	0.905	0.835	0.883
总体覆盖率	0.858				
总体一致性	0.935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表示外围条件存在，⊙表示外围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该前因条件存在与否对结果无显著影响。

在引起茶农对单丛茶文化系统高综合价值认知的所有组态路径中均包括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认知变量。二者同时也是必要条件，说明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认知在前因变量中处于核心地位。结合量表中的问题，这表明，茶农不但重视产量和经济收入，而且重视生态保护和管理。各组态路径除了体现上述两个关键价值维度外，还反映不同类型农户对单丛茶文化系统多元价值认知及其背后的生计行为差异性。具体分析如下。

①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在该组态路径中，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核心条件，还包含茶叶品质价值认知。此类农户的高价值认知主要源自其认同生态茶园管护对茶叶质量的积极影响。“古茶园的

^①因篇幅所限，相关图表可在中国知网或《中国农村经济》官方网站查看本文附录。

核心价值就是生态，好的生态带来了好的产品，好的产品才能卖上好的价格。”（FH-1-4）^①在传统农业系统中，经济价值构成了农户生计行为的基础，而生态价值则强化了经济价值所带来的正向影响。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特征主要表现在遗产地范围内有较大古茶树种植面积的茶农身上。这些茶农凭借古茶树的自然资本优势，实现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对自然与市场的风险感知不强。

②文化—精神价值导向型。在该组态路径中，除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外，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是核心条件。此类农户强调传统农业系统的历史文化价值、生产技艺的传承性与独特性，以及传统加工技艺所带来的价值。他们普遍认同单丛茶文化系统的文化资本，同时会主动将生产技艺的传承性和独特性作为文化标签，并将其赋予农产品。在此过程中，传统农业系统的文化价值外显为农户的文化认同，并通过长期传承的精神价值强化为身份认同，形成了区域农户共同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寄托。相较于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农户，文化—精神价值导向型特征主要表现既在遗产地范围内拥有古茶树、又具有单丛茶加工技艺传承家族历史的农户身上。正如部分非遗传承人农户在访谈中谈道：

“我们家世代传承单丛茶的种植和加工技艺，孩子刚上初中就要开始学习春茶的制作工艺，我和我哥哥也都是单丛茶加工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FH-1-17）

“我们这片家家户户都对单丛茶的加工（技艺）有传承，各家的茶味也有所不同，基本上各家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也不会像其他一些地方相互竞争……逢年过节大家都会互送茶叶或是一起品茶交流，所以村里的关系也比较融洽。”（FH-1-18）

③品质价值导向型。在该组态路径中，除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外，品质价值即茶叶的安全和口味是核心条件。品质价值导向型农户主要是在高海拔地区种植面积较小、古茶树树龄和生态种植规模上并不占优的那部分农户。品质价值导向型农户对质量价值的认同来源于不同农户个体和家庭背景的差异，他们在历史文化禀赋上的弱势使其通过提升茶叶质量来实现与文化—精神价值导向型农户的差异化发展。此类农户自然与文化资本不具有优势，因而，尝试通过各类第三方认证与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和文化—精神价值导向型农户进行差异化竞争。这不仅为单丛茶文化系统的保护带来正向影响，也为茶园管理和茶叶生产带来正外部性。正如部分农户在谈及品质价值时所言：

“我们家是2009年才从福建搬来这边种茶的^②，论茶叶加工技艺的历史，我们不如这里的本地人，但福建那边也种乌龙茶，我自己也对茶园的种植管理和茶叶加工技艺进行了一些改良，我们的产品也有老顾客年年来买……只有茶做得好，茶园的价值才能实现。”（FH-3-2）

“单丛茶系统的核心价值就是茶叶的质量，质量需要两头兼顾，所以茶园那边我们响应政府的政策，积极搞生态茶园认证，搞茶园的土壤理化数据分析……我们的茶叶每年也拿去参加各种茶叶质量评比，这些年也在做茶叶的绿色产品和有机产品的认证。”（FH-4-5）

④经济价值导向（风险趋避）型。在该组态路径中，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风险感知是核心条件。

^①本文案例编码由村落编号和受访者编号构成。其中，村落编号见表3。例如，“（FH-1-4）”表示“凤凰镇大庵村的第4位受访者”。

^②自2008年开始，单丛茶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

经济价值导向（风险趋避）型农户明显追求茶叶产值，但受制于自然风险感知和市场风险感知，会对生态价值实现形成一定抑制。该组态路径用以代表高海拔地区种植面积较小、茶园较为“碎片化”的农户，以及低海拔地区以单一茶业经营生计策略为主的部分农户。

在高海拔地区，如果农户茶园面积较大且地势相对平坦，其经营成本一般较低^①；如果农户茶园面积较小或较为“碎片化”，且茶园地势相对陡峭，其经营成本则相对高昂^②，进而导致农户对古茶树生态价值的信心受挫。有茶园面积较小的农户在访谈中谈道：

“我们家兄弟有三个，结婚后家里的茶园也作为家产分了三份，我们村的茶园本来都比较陡，分完后茶园面积更小了。2008年和2016年两场冻灾使我们损失都很大，那两年几乎绝收了，所以，我们现在很怕天灾，剩下的这些老茶树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一棵棵都要守好。”（FH-2-1）

在低海拔地区，“低山茶的市场价格远不如高山茶”（FH-5-2），由于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限制，农户的经济价值依赖和风险感知更为突出。茶农不得不通过扩大产量来维持生计，此类生产行为不但降低了生态价值，而且同质竞争进一步加剧市场风险。此外，自然风险也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旱灾和虫灾。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风险促使此类农户首先关注家庭的经济需求。正如部分农户在谈及旱灾和虫灾时说道：

“跟高山的冻灾不同，我们这里海拔低，受冻害影响小，但近三年旱灾非常严重，茶园特别旱，村里的小溪有段时间甚至断流了。”（FH-5-4）

“旱灾跟虫灾都是前后脚来的，茶园旱完，一些虫灾就更严重了，有的虫子咬完今年（茶树）可能就绝收了，甚至茶树直接就病死了。”（FB-1-9）

相对于古茶树资源较为丰富的部分农户，尽管单从茶文化系统为经济价值导向（风险趋避）型农户带来的经济收益尚可，但由于自然资本的劣势，他们在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转化过程中的效率并不高，特别是部分农户全年疲于农业生产活动，“一年要干四四季，从年头到年尾都在‘农忙’”（FH-5-2），更加难以体会到生产经营所能带来的愉悦感，难以感受到身份认同带来的精神价值。这表明，在生计资本受限的情况下，部分农户以追求生产保障性的经济价值为主，对传统农业系统多元价值和多功能性无暇深入了解。

⑤景观—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在该组态路径中，景观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认同为核心条件。景观—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农户在单从茶文化系统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关系上，进一步认识到传统农业系统景观价值的潜力。在访谈中有农户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茶园是我们世代劳作守护的，我也希望这些美丽的茶园能够走出凤凰山，让外面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里茶园的美，感受到我们潮汕文化的独特性。”（FH-1-13）

景观—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农户在高海拔和低海拔地区均有分布，但在不同海拔的地区，农户特征有所不同。在高海拔地区，景观价值被农户视为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载体，特别是景观价值伴

^①此类农户以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和文化—精神价值导向型为代表。

^②此类农户以经济价值导向（风险趋避）型为代表。

随着茶园管理和茶叶技艺的传承被外化为一种地域文化符号。农户对景观价值的认同大多是将其视为提升单丛茶文化系统影响力的途径，且不影响茶园的生态价值实现。此类高海拔地区农户的景观价值认知来源于对传统农业系统的自发认同，他们对景观价值的需求并非完全基于经济动机。正如一位经营民宿的农户在访谈时所述：

“我觉得我们的茶园有很强的旅游发展潜力，但村里很多人都挺害怕游客太多，会破坏茶园的环境。我搞旅游只是我的个人兴趣而已，游客来这里住一晚我赚不了多少钱，但来到这儿的游客大多都认可我们家茶园和茶叶，我也是希望游客回去后能给我多宣传宣传。”（FH-1-1）

低海拔地区农户对景观价值的认知则直接与旅游开发相关联，认同茶园的景观价值可以通过观光和民宿等旅游产品转化为经济价值。在此过程中，景观价值的实现不仅能够缓解部分自然资本弱势农户在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矛盾，而且使农业从单一的茶业经营生计策略转化为茶旅复合经营生计策略。此类农户对景观价值的认知来自对传统农业系统非生产性功能拓展的需求，通过多元价值的优化组合实现经济价值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农户对精神价值的认同度仍不高，属于“经营型”倾向。正如有农户在谈及茶园旅游经营时说道：

“我们家在汕头开了茶叶店，有自己稳定的客源，茶园的经营能够为我们带来稳定的收入，但这两年茶叶的行情都不太好……政府的茶旅走廊吸引了好多外地的游客，我们就想把茶园也向游客开放，家里也改成民宿，这部分收入不稳定，但也能补贴一下家用。”（FB-1-4）

“游客来茶园玩过一段时间后，对我们的茶叶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的茶叶在线上也更好卖了，有些来旅游过的老客户还经常给我们介绍新客户。”（FH-6-1）

不同于经济价值导向（风险趋避）型农户，景观—经济—生态价值导向型农户在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景观价值的实现或转化上，对单丛茶文化系统的认知更多集中于生计维持和经济价值拓展。同时，由于在农业社区内缺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强社会关系连接，此类农户对精神价值表现出较强的不认同态度。正如一位低海拔地区农户在谈及村内关系时说道：

“不管是加工茶叶还是搞旅游，茶园对我们来说就是家庭的营生而已……村里很多是外来户，大家邻里关系虽然都很融洽，但跟山上那些“一个村就是一家人”还是有区别的^①。”（FB-1-3）

生计自由度是家庭或社区自由选择以及转换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农户在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脆弱性背景因素下，基于家庭生计资本这一生计自由度主要制约因素判断生计利弊，能够形成对单丛茶文化系统的价值认知，进而呈现农户生计行为分化和生计结果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制度和组织构建等外部因素角度分析农户传承意愿。

3. 农户传承意愿影响因素特征。由于必要性分析中没有发现影响单丛茶文化系统传承意愿的必要条件，本文在简单解和中间解结果^②的基础上，利用 fsQCA 进一步分析农户高、低传承意愿的充分条

^①高海拔地区的茶农以世代居住为主，每个自然村基本上以一个同姓宗族为单元；而低海拔地区的农户多为近 20 年来新近从事茶园生产经营的移入者。

^②因篇幅所限，相关图表可在[中国知网](#)或[《中国农村经济》官方网站](#)查看本文附录。

件的组合（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农户高传承意愿、低传承意愿下的5条组态路径，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平均高于0.75，表明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有效性。总体一致性分别达到0.934和0.913，高于0.85阈值（Ragin, 2014），表明5条组态路径对相应案例群体具有较高的解释力。从有效的制度和组织构建角度来看，农户的传承意愿与其对利益相关方的角色认知存在关联。在影响农户传承意愿的组态路径中，茶农角色对于高传承意愿的农户而言是核心条件，而政府角色则是低传承意愿农户的核心条件。结合量表中的问题，这反映高传承意愿农户的自我认同和责任意识，以及低传承意愿农户对政府角色介入的期许。各条路径除了包含茶农与政府等关键利益相关方外，还体现了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形成有效的制度进而促进传统农业系统传承时的复杂性。

表7 不同传承意愿下认知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分析结果

	高传承意愿			低传承意愿	
	茶农—政府协作型	茶农自主型	茶农—游客协同型	政府依存型	政府—游客依存型
信息渠道	●		●	⊗	⊗
茶农角色	●	●	●	●	
政府角色	●			●	●
游客角色		⊗	●		⊗
原始覆盖率	0.624	0.561	0.481	0.529	0.427
唯一覆盖率	0.078	0.038	0.082	0.052	0.026
一致性	0.938	0.828	0.805	0.842	0.826
总体覆盖率		0.917		0.872	
总体一致性		0.934		0.913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表示外围条件存在，⊗表示外围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该前因条件存在与否对结果无显著影响。

高传承意愿存在3条组态路径。

①茶农—政府协作型。在该组态路径中，茶农和政府角色是核心条件，辅以信息渠道影响茶农对单从茶文化系统的高传承意愿。茶农—政府协作型用以代表高海拔地区拥有古茶树资源且其保护受到政府重视的部分农户。古茶树作为遗产地的重要保护性资源，受到政府的充分重视，农户的现实需求通过村级自治组织得到正向反馈。对于部分拥有古茶树资源的农户而言，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社区空间已经形成了茶园保护的非正式制度，积极的生产意识也促成了农户自身责任意识的形成。农户对政府的保护行为表达出认同，也对自身责任有清晰的认识：

“政府对我们这里的古茶树保护比较重视，每棵古茶树都进行了挂牌登记，我们遇到困难可以直接反映给村主任，当地政府也能很快处理……当地政府和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等合作，在我们这里进行害虫防治的试点，还有茶园管理的培训，政策对我们确实好。”（FH-1-8）

“我们自己（农户）才是古茶树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村里人都比较自觉，没有什么人会去搞什么破坏茶园的事，大家都遵守村里一直以来的规矩。”（FH-1-5）

②茶农自主型。在该组态路径中，茶农角色是核心条件。农户非常认同自身在传承保护中的责任，

对政府角色的感知不强，同时认为游客对单丛茶文化系统保护的责任不大。茶农自主型代表在高海拔地区拥有古茶树资源，但家庭居住条件欠佳且茶园地理位置偏远的部分农户。茶农自主型农户以个体和家庭的保护投入为主，但是，他们受到游客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地势陡峭、道路狭窄，游客的长期通行和不当行为干扰了农户的日常生产生活，导致他们对游客群体产生了抗拒情绪。在谈及游客影响时，部分农户表现出较强的不满情绪：

“（每天）有大量游客要到山顶的天池景区玩，西边的路没修的时候，游客每天的车子从早到晚，很影响我们的生活。^①”（FH-2-8）

“有些游客路过我们门口的菜园，还会偷摘蔬菜，我们也没啥办法。”（FH-2-7）

“茶园保护跟游客没啥关系，说到底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政府要是能给我们这边的路扩一扩就好了，但目前看也不现实。^②”（FH-2-10）

除了对游客的不满之外，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该地区能够落实的惠民政策也较为有限。这使得单丛茶文化系统的茶园管理和保护传承更多地依赖农户个人行为。然而，传统农业生计为这部分农户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因而他们仍旧保持着高传承意愿。

③茶农—游客协同型。在该组态路径中，茶农与游客角色并重，均被农户视为核心条件。茶农—游客协同型代表在茶叶生产的基础上，同时开展民宿或观光旅游经营以实现茶旅融合发展的部分农户。茶农—游客协同型农户不但认同自身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保护主体责任，而且认为游客也能够认识到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这主要得益于茶园景观依托区域内其他旅游资源实现了“搭便车式”的补充发展。农户通过旅游经营的生计策略实现了兼业，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和可持续的生计选择。游客事实上已成为传统农业系统保护传承的补充力量，因而促进茶农—游客协同型农户保持较高的传承意愿。此类农户普遍对游客表达出欢迎态度：

“游客来茶园，他们可以体验到我们茶园风光的美，我们通过旅游经营的收入也可以补贴茶园保护。”（FH-5-2）

“很多游客夏天会来坪溪水库这边避暑，到我们这边村里过夜，早上去观茶亭那边看看玩玩，一来二去，游客也给我们这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帮助。”（FB-2-7）

低传承意愿存在 2 条组态路径。

①政府依存型。在该组态路径中，政府角色被视为核心条件。农户认同政府的保护责任和产业扶持力度，但认为茶农自己的作用稍弱，对单丛茶的各类信息和知识缺乏稳定的获取渠道。政府依存型代表低海拔地区以茶业为单一生计的部分农户。一方面，低海拔地区农户获取信息主要通过村委会和村民，“大家（对茶农协会）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参加的人不多”（FB-2-4），茶农协会在信息渠道中的知识传递作用相对有限。另一方面，由于茶叶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难以实现，政府往往被视为

^①除茶园外，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是单丛茶文化系统上方山顶的凤凰山天池景区，在绕行村落的旅游道路没有修建之前，村内的道路是前往景区的必经之路。

^②在海拔最高的 3 个村落，即狮头脚、李仔坪和中心沿村，农户的房屋修建在山路两侧，扩建道路并不具备现实条件。

促进传统农业系统传承的核心主体，农户对维持传统农业系统生产表现出较低的意愿，而对政府的政策介入表现出较强的期待。对此，许多农户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现在茶叶价格很低，加上旱灾、虫灾、冻灾经常发生，茶园经营成本很高，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单靠我们自己真的很难……现在种茶只能说还可以维持生活，但是，过些年谁也不知道茶叶行情会怎样，孩子们能读书的就多读书，我不太希望他们回来种茶。”（FH-5-11）

②政府—游客依存型。在该组态路径中，政府角色同样被视为核心条件，而茶农的自身认知较为模糊，同时，他们认为游客与单丛茶文化系统不相容。政府—游客依存型特征主要表现在低海拔地区有强烈旅游发展意愿但实际发展成效较弱的部分农户身上。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游客依存型农户对游客并非持反对态度，而是对旅游发展没有惠及本社区感到不满。一些农户由于生计资本较为薄弱，对旅游经营生计方式有较强的现实需求，但旅游资源和游客的供需错配导致他们开展旅游经营较为困难。这在观光旅游资源较丰富但游客稀少的村落更为突出，导致农户传承意愿降低。部分农户谈道：

“我们很希望能够对茶园进行一些改造，让更多的游客也能来我们这里看看，这样不管是搞点餐饮还是民宿，我们的收入都能提高一些。”（FH-5-1）

“我们这里的茶园景色其实也挺不错的，但很多游客都是慕名前往山顶（天池景区），不管是自驾还是组团的游客，大都只是路过村庄，很少有人拐过来玩或者专门来玩。”（FH-6-4）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由于价值认知和主体责任意识的差异，其传承意愿存在高低分化，对政府政策工具的期待呈现“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差异。因此，农户传承意愿的提升需要因势利导，在了解其价值导向的生计策略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外部政策促进农户生计方式优化调整。

4. 稳健性检验。为了提升 fsQCA 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本研究通过调整一致性门槛阈值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一致性阈值由 0.75 调整至 0.80 进行组态分析。对比结果发现，10 条组态结果仍然保持不变，说明前文得到的组态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进一步讨论

农户在传统农业系统的多功能价值认知基础上的生计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农户能够根据生计资本灵活调整生计策略，以达到家庭收益最大化。建立在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认知基础上的多样化生计策略，能够使农户对自然资源开展可持续利用和有效管理。这不仅缓解了生态保护中社区发展可能面临的潜在冲突，同时提升了社区通过传统知识和非正式制度维持生计可持续性的能力。

传统农业系统能够成为农耕文明中优秀生态文化传承的载体。从文化—精神价值导向型农户群体可以看出，尽管农户的价值判断以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前提，但不少农户对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认知源自集体性的生态文化认同。这种认同赋予农户保护与传承传统农业系统的责任意识和自我能动性，进而形成生态文化自觉，能够体现在高传承意愿茶农的角色认知上。生态文化自觉催生了适应于本地的生态化生产模式，孕育和传承着万物共生、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智慧。传统农业系统中的生态文化融于农户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生态文化传承发展的生产生活氛围，凝聚着生态文化价值主张的向心力。因此，传统农业系统作为农耕文明的优秀遗产，蕴含着农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能够在传承中更好地展现中华农耕文明的魅力和风采。

农户在价值认知基础上的生计策略灵活性和适应性受到生计自由度的动态影响。对高综合价值认知的组态路径分析表明，在传统农业系统中，基于家庭生计资本的生计自由度差异影响生计策略。而制度与组织构建对传承意愿的分析则表明，外部政策能够促进生产性功能以外的传统农业系统多功能价值的经济转化，弥补自然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的劣势，进而提高低生计资本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价值的整体认知，逐渐实现由经济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过渡和传承意愿的提升。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传统农业系统具有丰富的价值，可以贡献于中华农耕文明传承和生态文明建设，其延续和发展依托农户的价值认知及其传承意愿。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感知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广东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作为典型案例，构建了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认知影响其传承意愿的机制，通过探究不同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认知和传承意愿组态组合，揭示了农户价值认知的异质性及其对传统农业系统传承意愿的影响。这些差异化的价值认知与外部政策的互动，外显为农户基于价值取向的生计策略，而这些生计行为策略又通过资源保护和利用带来不同的生计结果，进而影响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意愿。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的传统农业系统传承意愿以其多元价值认知为基础。从传统农业系统传承视角来看，具有高综合价值认知的农户往往对自身责任有清晰的认知，传统农业系统不仅是农户的生计资本，同时也蕴含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多元价值，需要守护和传承。在传统农业系统传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锦上添花”。第二，农户的传统农业系统传承意愿直接受到外界制度催化下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认知影响，同时，丰富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有利于提高农户的保护责任认同和保护行动参与意识。第三，农户对传统农业系统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认知能够强化为身份认同，进而提升农户的传统农业系统传承意愿。

由此进一步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其一，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保护政策，需要重点关注农户群体内部的价值认知和生计能力差异，采取精准化的措施。如果将传统农业系统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来维持，就需要对不同生计自由度的农户实施差异化政策，赋予居民更高的生计选择权，增加不同生计策略的流动性，以促进居民选择最适合的生计策略，最终通过生计资本的合理配置提升生计可持续性。这样才能在保障农户生存权益的基础上促进传统农业系统传承和生态保护目标的优化协同。

其二，在各类政策实施前后，要重视农户个体和社区群体层面的文化与情感因素在促进传统农业系统传承中的作用。传统农业系统往往由农户家庭世代传承，并以农业社区为核心形成区域居民的集体价值认同。在一些文化因素（如农耕文化、生态文化或民族文化）影响较强的地区，经济价值认知可能并非农户进行生计选择和传统农业系统传承的唯一因素，相关保护政策制定应重视社区内部所形成的文化范式和非正式制度。

其三，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优秀农耕文化传承的抓手，强化传统农业系统的整体性保护与传承，健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和多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优秀农耕文化活态传承的载体，需要建立以农业农村部门为主导的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机制，在遗产保护、文化传承、风险管理、遗产监测和法治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形成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强大合力。

参考文献

- 1.杜运周、贾良定，2017：《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管理世界》第6期，第155-167页。
- 2.党国英、郭宇星、张连刚，2024：《地理标志引领民族山区和美乡村建设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新内源发展视角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第96-118页。
- 3.范香花、程励，2020：《共享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基于fsQCA方法的分析》，《旅游学刊》第4期，第36-50页。
- 4.顾兴国、楼黎静、刘某承、闵庆文，2018：《基塘系统：研究回顾与展望》，《自然资源学报》第4期，第709-720页。
- 5.何思源、李禾尧、闵庆文，2020a：《农户视角下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主体》，《资源科学》第5期，第870-880页。
- 6.何思源、闵庆文、李禾尧、刘某承、焦雯珺、白艳莹，2020b：《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I）：价值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研究》，《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第9期，第1314-1329页。
- 7.胡银根、杨春梅、董文静、齐琪、张也、林书达，2020：《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决策行为研究——以安徽省金寨县典型试点区为例》，《资源科学》第4期，第685-695页。
- 8.焦雯珺、崔文超、闵庆文、张永勋，2021：《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综述》，《资源科学》第4期，第823-837页。
- 9.李禾尧，2021：《农业文化遗产关键要素识别及管理研究——以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为例》，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0.李华胤，2022：《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现实价值》，《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第2-18页。
- 11.刘少群、陈丽佳、张巨保、穆显良，2010：《广东潮州凤凰茶的发展历史及品种体系成因》，《农业考古》第2期，第207-211页。
- 12.闵庆文，2020：《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的优先领域、问题与对策》，《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第9期，第1285-1293页。
- 13.石志恒、张可馨，2022：《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研究——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干预模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3期，第28-35页。
- 14.隋斌，2023：《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演进、思想理念及对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启示》，《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第2-17页。

- 15.杨福霞、郑欣, 2021: 《价值感知视角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4期, 第164-171页。
- 16.张灿强、林煜, 2022: 《农业景观价值及其旅游开发的农户利益关切》,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131-140页。
- 17.张明、杜运周, 2019: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 《管理学报》第9期, 第1312-1323页。
- 18.朱志平、王思明, 2021: 《价值挖掘与路径选择: 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研究》, 《中国农史》第6期, 第134-146页。
- 19.Creswell, J. W., and V. L. P. Clark, 2017,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116-118.
- 20.D'Annolfo, R., B. Gemmill-Herren, D. Amudavi, H. W. Shiraku, M. Piva, and L. A. Garibaldi, 2021, "The Effects of Agroecological Farming Systems on Smallholder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n Push-Pull System from Western Ken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19(1): 56-70.
- 21.DFID, 1998, "Key Shee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view", <http://cdn-odi-production.s3-website-eu-west-1.amazonaws.com/media/documents/3219.pdf>.
- 22.Jiao, W., W. Cui, and S. He, 2023, "Ca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Keep Clean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Qingtian Rice-Fish Culture System of China Based on Carbon Footprint", *Sustainability Science*, 18(3): 1397-1414.
- 23.Khan, I., H. Lei, I. A. Shah, I. Ali, I. Khan, I. Muhammad, X. Huo, and T. Javed, 2020, "Farm Households' Risk Perception, Attitude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Promise and Perils from Rural Pakistan", *Land Use Policy*, Vol. 91, 104395.
- 24.Mwantimwa, K., 2020, "Livelihoo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Needs, Access, and Exchange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Bunda District, Tanzania", *Rural Society*, 29(1): 30-43.
- 25.Nath, T. K., M. Inoue, Y. E. Wey, and S. Takahashi, 2024,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n Japan: Investigating Selecte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Values for Farm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Vol. 22, 2355429.
- 26.Ragin, C. C., 2014,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2-24.
- 27.Su, M. M., Y. Dong, G. Wall, and Y. Sun, 2020, "A Value-Based Analysis of the Tourism Us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Duotian Agrosystem, Jiangsu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8(12): 2136-2155.
- 28.Thanh, B. N., T. L. V. Thuy, M. N. Anh, M. N. Nguyen, and T. N. Hieu, 2021, "Drivers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Vietnamese Mekong Delt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Vol. 122: 49-58.
- 29.Woodruff, R. B., 1997, "Customer Value: The Next Sourc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Vol. 25: 139-153.
- 30.Zeithaml, V. A., 1988,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 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52(3): 2-22.

31.Zhang, Y., A. Zhan, and Y. Ma, 2024,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and Challenges of Mountaino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Hani Terraces,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2(1): 101-118.

32.Zhu, G., X. Cao, B. Wang, K. Zhang, and Q. Min, 2022, “The Importance of Spiritual Ecology in the Qingyuan Forest Mushroom Co-Cultivation System”, *Sustainability*, 14(2): 865-888.

(作者单位：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²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³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柳 荻)

Guarding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How Does Rural Households’ Value Perception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Inherit?

WANG Bojie HE Siyuan MIN Qingwen SUN Yehong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represented by agri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goals and continuing China’s excellent farming culture. Taking a typical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 the Dancong tea cultural system (DTCS) in Chaozhou,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ses how rural households’ value percep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inherit, by combin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and the inductiv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QCA)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households perceiv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values as the core value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the interactive and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among other values reflect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based on value orientation. Rural households’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in livelihood strategies are affected by the dynamics of livelihood freedom, and their livelihood outcomes and willingnes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show complexity and heterogeneity.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of rural households show divergent attitudes towards government policy tools, either as “icing on the cake” or “timely assistance”, due to differences in value perceptions and awareness of the subject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the willingn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to inheri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It also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realizing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rural households,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China’s excellent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Keywords: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Farming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Value Perceptions